



你家“神兽”对奥特曼卡片着魔了吗

新学期伊始记者走访学校发现奥特曼卡片风靡家长苦恼不已

● 有不少未成年人沉迷收集奥特曼卡片,动辄花费成百上千元,有的还偷拿家里的钱或借钱买卡片,让一些家长苦恼不已

● 奥特曼卡片在未成年人群中盛行的原因,除了盲选形式、稀有收藏的诱惑,可能还与朋辈群体社交关系的建立有关,未成年人通过积攒、交换、赠予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共同语言、寻找新的友谊

● 必须在制度层面对带有博彩性质的“盲盒”“卡包”等立规矩、划红线。家长要及时发现、合理引导;监管部门应对生产和售卖“盲盒”卡片的商店予以处罚;学校应明令禁止玩耍“盲盒”类卡片

□ 本报记者 陈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9月10日下午5点半,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学门口,放学后走出校门的5年级学生李林快速拉上妈妈穆女士,兴冲冲地跑向附近的便民市场,来到一文具摊位前,熟练地拿起两包奥特曼卡片。每包5元,穆女士支付了10元。

还没走出市场,李林就撕开了其中一个卡片包。“又‘抽砸’了,一张好卡都没有。”他快速翻开后自言自语道,并随手将该卡片包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我家孩子对奥特曼卡片像着魔了一样,天天缠着要我买,现在已经集了好几册了。”穆女士无奈地摇摇头对记者说。

像李林这样迷恋奥特曼卡片的小学生还有很多。

新学期开学后,《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发现,有不少未成年人沉迷收集奥特曼卡片,动辄花费成百上千元,有的还偷拿家里的钱或借钱买卡片,因与同学比较卡片优劣或为得到对方稀有卡片而发生口角乃至打架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让一些家长苦恼不已。

商家紧挨学校大门 学生花费千元买卡

李林“卡龄”1年,他所收集的奥特曼卡片,多数是在学校附近那家便民市场的文具摊位购买的。

穆女士说,今年暑假,她带李林回老家,儿子随身带着一本奥特曼卡册,平时除了和小伙伴疯跑之外,一闲下来就是翻看卡册,一边翻还

一边念叨奥特曼的名字,“背课文记不住,奥特曼的名字倒是记得很清楚”。

8月上旬,因疫情防控学校建议学生提前返京,李林就开始筹划着要买奥特曼卡片,开学仅两周,他就已经买了3次卡片了。

在李林买卡片的摊位,记者看到,这个仅10平方米左右的摊位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奥特曼卡片,每包价格从两三元至三五十元不等。

李林告诉记者,他买的5元卡片包里有8张卡片,买之前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卡片,就像抽“盲盒”,购买之后撕开卡片包,可能“抽砸”,也可能抽中一两张“好卡”。

所谓“抽砸”,就是卡片包里全部是普通卡片,没有稀有卡片,不少同学就将这些普通卡片扔一边或直接扔进垃圾桶,而所谓“好卡”,即奥特曼卡片稀有卡,比如XR卡(稀有满星卡),SSR卡(满星卡),HR卡(升级版3D卡)等。

李林称,他所在班级共有36人,至少一半人购买或收集过奥特曼卡片,“我的卡是最多的”。穆女士告诉记者,仅一年时间,李林花在奥特曼卡片上面的费用就达千元。

记者询问店家卡片的销售情况,店家直言“卖得挺好,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记者走访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以及天津市蓟州区等地多个学校附近的便民市场和文具店,发现多数在售卖奥特曼卡片,价格在几元至几十元。有一家售卖奥特曼卡片的文具店甚至紧挨着小学门口,放学后有不少小男孩缠着家长买卡片。

多地小学盛行集卡 家长不知魔力在哪

李林在一家校外足球俱乐部学踢足球,他的队友赵猛家住北京海淀区,是某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学生,赵猛“卡龄”有3年,已收集了好几本卡册,他的卡片有的是从学校附近实体店购买,有的是从网上购买。

在这些奥特曼卡片里,赵猛最喜欢的是一套奥特曼周年纪念版卡片。这是去年冬天,他所在团队踢足球比赛获得第一名后爸爸给他的奖励。

说起这套卡片,赵猛侃侃而谈——卡片总计有64张,分为两种包装,一种是固定包,含XR卡2张、固定卡片30张;一种是随机包,每包有XR/GP/LGR卡随机2张,UR、HR、SR卡各1张,R卡3张。此外,商家附送卡砖1个,收藏册一本。

赵猛的父亲赵鹏告诉记者,这套卡片是他花350多元在网上买的。他说,孩子特别喜欢奥特曼卡片,他就拿卡片作为对孩子踢好球的激励,拆开时孩子都欢呼了起来。

记者登录赵鹏所说的网上购物平台,看到各种品牌的奥特曼卡片,其中某品牌奥特曼卡片旗舰店有169万人关注,在售卡片种类超过20种,有的奥特曼成套卡片售价高达几百元,有爆款卡片的销量达2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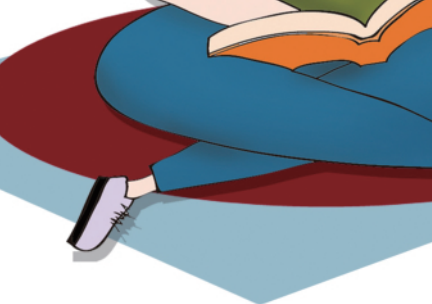
看到赵猛如今越来越沉迷奥特曼卡片,赵鹏有些担忧。

采访中,多位家长都表示无法理解为何小孩子会如此喜欢奥特曼卡片。

穆女士说:“我并不觉得这些卡有啥价值,不懂这些卡片的魔力在哪,但孩子有空就摆弄,谈起卡片眉飞色舞。”

更让穆女士不理解的是,孩子所在的足球队,人人收藏奥特曼卡片。有段时间,队员们在训练间隙聊卡片,教练不得不作出要求,再带卡片到训练场就没收。

不仅在北京,据公开信息,奥特曼卡片已在多地小学生群体中流行。今年2月,山东省青岛市刘女士的儿子在短时间花4000多元购买奥特曼卡片;今年8月,广东省中山市一名7岁儿童



在家里偷拿了2500元买奥特曼卡片。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的单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儿子单晓今年上五年级,其所在班级52人中买卡集卡的有30多人。单晓已有3年多买卡经历,几乎每周都要花十几元买奥特曼卡片。

为抢卡片打架斗殴 家长吐槽“玩疯了”

看到儿子如此沉迷奥特曼卡片,穆女士开始限制他的零花钱,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她更加苦恼。

暑假回老家期间,姥爷给李林一岁的妹妹500元见面礼,一转眼,李林就从妹妹手里拿走了200元。为了攒钱买卡,李林开始在家里收集快递纸箱和塑料瓶,然后拿去当废品卖。

而赵猛的做法是把一些重复的卡片卖给同学和卡友。

赵鹏告诉记者,最近儿子赵猛以每张30元的价格卖给同学4张卡片,自己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他,并让他把钱退给同学,“这事儿要是让对

方家长知道,还不得来找我们?小小年纪怎么能这样呢”。

这并不是赵猛第一次卖卡片。今年年初,赵猛花25元从同学手中买了一张卡片,然后以5元转卖给另一位同学。前不久,他还转让给球队一名队友一张卡片,收了对方15元。

赵鹏当时觉得钱不多,就没有介入管教,没想到赵猛竟将此当成一桩生意。赵猛则认为,同学、队友之间转让卡片是你情我愿,无可厚非。单先生颇为担忧地告诉记者,在他儿子所在的学校,有小學生向同学借钱买奥特曼卡片,甚至有小学生看见同学买到稀有卡片直接上手就抢,没抢到就打了起来。

此次打架事件发生在学校门口,当时是中午,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一个男同学抽到一张UR稀有卡片,另一个男同学想要,一把抢了过去,结果双方围绕这张卡片打了起来。

“玩疯了。”单先生这样描述一些小學生玩奥特曼卡片的状态。

穆女士对此表示赞同,现在李林只要有时间就拿出卡册一张一张地看,写作业时也要拿出来看一看,即使上学也要带着。

“怎么办?”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
(文中李林、赵猛、单晓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压实监护监管责任合理引导“卡片社交”

□ 本报记者 陈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奥特曼卡片等动漫卡正在未成年人群中风靡。孩子们痴迷,家长们无奈,更令家长们苦恼的是,商家以“盲盒”销售手段过度宣扬稀有卡片及其价值,不断推出新的稀有卡片吸引未成年人持续购买。

商家采用上述销售方式是否适当?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框架下,家长该如何应对?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秦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运慧,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治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治杰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

文化认同加上社交属性 导致积攒卡片风靡一时

记者:该如何看待奥特曼卡片及其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的盛行?

王运慧: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有一个英雄梦。奥特曼英雄系列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回忆,每一个英雄都是拯救地球的化身,从初代到迪迦,从佐菲到泽塔,孩子们喜欢、崇拜他们无可厚非。商家据此开发卡片进行销售,使得未成年人购买奥特曼卡片现象在各地流行也无可厚非。

但据观察,当前不少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影响学习和心理健康,让越来越多家长担心和焦虑。同时,很多小学生把卡片带到学校里进行交换和攀比,不仅容易导致同学之间产生矛盾纠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课堂秩序。

未成年人的自制力相对较差,容易被新异刺激的表象所吸引。商家利用这种特点,吸引未成年人持续购买,起初家长觉得孩子在崇拜英雄而疏于管教,一旦形成“卡瘾”为时已晚。因

此,亟待家庭、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和重视。

记者:奥特曼卡片在未成年人群中盛行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袁治杰:人们形成社会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是融入消费文化,形成文化认同。大家都玩的时候你不玩,你没法融入这个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买卡集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未成年人认可奥特曼卡片,这说明是基于对奥特曼动画片的认同而收集。商家满足未成年人的这种需求,也是有积极价值的。也就是说,商家获得了利益,孩子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感。从这个层面上看,让孩子沉迷其中的,不仅仅是卡片本身,还因为卡片具有社交的属性。

但与正常社交属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游戏卡片有一个沉迷机制,利用博彩方式,让你不停地往前走,这就是商家为什么持续不断推出新卡的原因,让你不停地追着买。这种卡片令人沉迷的原因就在于此。商家给普通产品赋予了游戏的属性,抓住了孩子的心态,一开始花很少的钱就能获得很多稀有卡片,形成吸引力,买着买着就上瘾了。

秦硕:除了盲选形式,稀有收藏的诱惑,可能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朋辈群体社交关系的建立,未成年人可能通过积攒、交换、赠予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共同语言、寻找新的友谊。

采用盲盒销售类似博彩 与未保法精神背道而驰

记者:一般情况下,奥特曼卡片被装在密封的袋子里,以2元、5元、10元、30元、50元的价格出售,商家将人为制造的稀有卡片与普通卡片混装,类似于“盲盒”,未成年人购买之后,拆“盲盒”以获得稀有卡片。商家使用这种销售方式是否适当?

秦硕:“盲盒”的魅力,很多成年人都很难抵抗,未成年人对于这种带有射幸行为的销售模式会产生更多的好奇和兴趣。叠加单次消费金额低、朋辈群体参与度高等因素,很难让孩子置

身事外。卡片的盲选销售形式及卡片收集的难易程度,让这种销售方式带有一定的博彩性。

袁治杰:商家根据动漫形象开发出卡片,将卡片作为商品对外出售,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商家将所谓的稀有卡片和普通卡片放在一个包里销售,使购买者如同购买概率一样获得所谓的稀有卡片,采用销售“盲盒”这样的方式,便具有博彩的属性。奥特曼卡片采用“盲盒”形式销售,实际上销售的是购买者拆出稀有卡片的概率。

王运慧:商家将奥特曼卡片装进“盲盒”,孩子们打开“盲盒”,如果有自己喜欢和追求的偶像则欣喜若狂、到处炫耀,如若没有则垂头丧气,甚至随意丢弃,想着下次如何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卡片。这种行为像极了买彩票,让幼小的心灵向往撞大运,迷信手气的好坏,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游戏行为,而是流行于未成年人群体之间的一种初级博彩行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的原则之一就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而这种现象明显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背道而驰,是一种潜在的违法行为。

商家的这种行为,可谓步步设套,层层诱惑。先是把卡片装进“盲盒”,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然后在卡片上设置星级标志,以满星10星为最高,激起孩子们的攀比心;最后配套售卖卡册,有大有小,诱惑孩子们积少成多,沉溺成瘾。因此,对这种行为必须依法予以治理。

定规划划红线迫在眉睫 监护监管务必同步齐下

记者:对于这种现象,家庭该如何应对?监管部门是否需要介入?

秦硕:实际上,家长们担心的高额消费、沉迷等现象,是孩子们无规则接触、无正确引导造成的。所以,疏堵需结合,家长应当关注的是如

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法治经纬

1988年至1993年,检察机关突出开展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加强了查办侵犯公民民主权力、渎职犯罪的工作,推进了各项业务建设与队伍建设,有步骤地对检察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为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动廉政建设、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立首个反贪污受贿工作组

刘复之(1917—2013),广东梅县人,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88年6月至1993年5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刘复之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带领全国检察机关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积极推进检察体制和机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各项法律监督工作,为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发展完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8年3月8日,为适应反腐败斗争需要,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主要负责受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经济犯罪案件,接受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这是全国检察机关成立的首个举报中心。1988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推广“深圳经验”,在全国检察机关广泛设立举报机构,并于当年12月颁布《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规范推进举报工作,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积极性。截至1988年底,全国有2784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站)或设置了举报电话。1989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报中心成立。

根据1982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自1986年起,检察机关开始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进行调研和试点。1988年9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民事行政检察厅,主要负责对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以及对下业务指导,研究制定有关业务细则、规定等。

民事行政检察厅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统筹推进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更加有效保障民事行政法律正确实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为更好适应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989年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挂牌成立全国检察机关第一个反贪污受贿工作组,主要负责组织、指挥全省检察机关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直接办理地、市、厅(局)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等。

这一机构的成立,对于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同年,全国大多数省级检察院和部分市、县级检察院组建了反贪污贿赂局,有力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

首次聘请特约检察员

1990年12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精神,在中央统战部支持指导下,经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推荐,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聘请18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察员,主要负责对检察业务工作中的专业性问题的提供咨询意见、对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和队伍建设情况进行民主监督等。

特约检察员制度的建立,对于检察机关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增强执法司法透明度,保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检察教育培训工作。199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创办的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基础上,成立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1998年更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先后为原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和更名后的国家检察官学院题写院名。

成立30年来,学院累计为检察系统培训领导干部、业务骨干、后备干部和其他各类人才10万余人次,成为高素质检察人才的培养基地。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国家检察官学院在全国设有30所分院,并在97个市、县级检察院设立了教学实践示范基地。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198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举报工作开展情况,公布最高人民法院举报电话,向社会宣布举报工作将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普遍开展。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建院以来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加强检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方式和途径,对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支持和监督推进检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加强检察新闻宣传工作,1991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创办《中国检察报》。同年4月,邓小平同志题写《中国检察报》报名;7月4日,《中国检察报》正式创刊。1996年1月1日,《中国检察报》由周四刊改为日报,并更名为《检察日报》。

创刊25年来,《检察日报》始终秉承“立足检察、面向社会”“就检察说社会,就社会说检察”的办报宗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and 法治、检察事业发展成果,成为检察新闻宣传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力军。

1992年5月4日至9日,第九次全国检察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会参见会代表,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复之作题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一心一意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报告。

会议总结了第八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以来的工作,研究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建设和发展检察工作的任务。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为新时期检察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良好的经济建设环境指明了方向。

本报记者 蔡长春 本报见习记者 杨佳艺 整理

推进检察工作强化法律监督职能